

諾貝爾文學獎秘史

10

王鴻仁譯

一九二三年

(愛爾蘭) 威廉·巴特勒·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不列顛才只出過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當時德國已有四位，法國也已經有三位了。

那時，哈代的聲名真可謂如日中天，同時他更在瑞典的新聞界裏頭擁有一羣為數可觀的支持者。因此大家都順理成章地認為：這位條件無比優越的文壇巨匠不久當可獲獎。他的名字曾數度為一些具備資格的英國權威人士所提出。現在這位悲劇小說的大師又在垂暮之年完成了一系列無瑕可指的詩篇——這使他的候選資格更形鞏固。無疑的，他已成為英國的一代文

宗，因此大家都預測：一九二三年的文學獎將會頒發給這位「黛絲姑娘」及「無名小子裘德」的作者。當然，哈代也遭遇到不少勁敵，其中包括湯瑪斯曼、溫狄茜以及高爾斯華綏等人。不過大家還是相信那年的獎金必然會落入英國之手。

結果，得獎人却是愛爾蘭的葉慈，這件消息所引起的震驚自然是不待細言了。

「直到今天恐英症還沒有絕跡！」一家言論大膽的瑞典報紙如此評論道。「當一個人被逼得非向西走不可的時候，他也要一直走到西方的盡頭才肯停下來

！」(註)評論家們並且指出：瑞典學院的此項抉擇裏頭隱含著「令人不快的」政治涵義。那時英國和愛爾蘭的關係非常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瑞典學院可以說是藉頒獎給葉慈來表明她支持愛爾蘭自由邦(Saorstát Éireann)的立場與態度。學院藉頒獎的決定來聲援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除此之外，還有一樁事實更加深了人們的不滿，那就是葉慈這個作家並不為大眾所週知。英國那邊也響起了一片咬牙切齒的聲音——不過英國人倒不是懷疑葉慈的才華，他們純粹是氣憤哈代再度受到忽視。

瑞典國內掀起了一片研究葉慈的熱潮。人們爭著查閱他的資料，細讀他的著作，翻譯他的詩。耶誕節還沒有到，他的全套戲劇已經都被譯成瑞典文了。這一切的一切好像在告訴人們：這屆的文學獎是頒給一個地位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富於原創力的作家——他同時也是一個新興國家的新文學領袖。

(註) 此語是指責瑞典學院抵死不肯頒獎給英國。英國位於歐洲之西，她的緊鄰愛爾蘭則是歐洲最西邊的國家。

事實上，瑞典學院的這項決定並非率爾從事的。

關於葉慈的個案資料早在一九〇二年——也就是蒙森獲獎的那年——便已建立了。那年葉慈是由一個比他年長很多的同胞，列齊(W. E. H. Lecky)所推薦的。列齊是一個相當博學的史學家，他的力作「十八世紀英國史」在法國也有人研讀。他從一八九五年起到一九〇三年去世為止，一直都是在下議院裏頭代表都柏林大學。他不遺餘力地向外國讀者介紹葉慈。他一九〇二的那封推薦函上面這樣寫著：「他確實是年輕而神秘，可是却才氣縱橫。我不敢妄稱他是我們現存的詩人當中最偉大的一位；我甚至不敢妄稱他是我們的詩人當中最受歡迎的一位；可是我從未見過任何詩人像他一樣，能够把真正的詩人稟賦和諸位所激賞的理想主義傾向融成一體——或者能對當代英國文學中之此一傾向施以如此巨大的衝擊。」

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葉慈的聲音越來越高，地位越來越穩固。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再度被列入瑞典學院的候選名單——這次是由皇家文藝協會的普朗基(G. M. Plunket)所推薦。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葉慈的名字重現於學院的議事單上，不過這次却

是由諾貝爾委員會主動提名的——因為該委員會的會長，霍爾斯陶穆（Per Hallström），是葉慈的熱烈崇拜者。霍氏認為哈代是一個曖昧的宿命論者，而葉慈則十分投合他的理想主義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像他這種「類型」的作家很容易打動學院院士的心，而予奪之權正是操在這些院士的手中！

葉慈曾經寫過一篇叫做「瑞典的厚禮」的文章。這篇文章於一九二四年刊登在「倫敦信使報」上面，後來曾印成單行本，最後被併入作者身後出版的「自傳」裏。這篇文章主要是描寫他對斯德哥爾摩的印象

。文章裏頭有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從貴國國王手中接受貴國學院賜予我的這份殊榮時，我覺得當時應該有一個年輕人的幽魂站在我的一邊，另一邊則應該站著一個活生生的、精力旺盛的老婦人。」這個意念使一九二三年的頒獎典禮籠上了一層塞爾特詩（Celtic poetry）的光輝——在那個典禮上，主辦當局向瞻禮的貴賓介紹這位愛爾蘭的詩人，並且說明他獲獎的理由：「由於他那種永遠充滿著靈感的詩——它透過高度藝術的形式展現了整個國家的精神。」

一九二四年

（波蘭）拉迪斯拉斯·S·雷蒙特
(Ladislas Stanislas Reymont)

瑞典學院將一九二四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波蘭的雷蒙特。雷蒙特——這位波蘭作家後來被人譽為「斯拉夫民族的賀西阿德」。（註）他和一九二〇年獲獎的哈姆生一樣，都是靠一部著作獲獎的——這點

只要看瑞典學院所發佈的讚詞便可明瞭。根據學院的讚詞，雷氏之所以獲獎乃是「由於他那部偉大的民族（註）賀西阿德（Hesiod）西元前八世紀的希臘詩人。

史詩——農民。」

那年總共有十八位作家參加角逐，其中包括一位雷氏的同胞——澤龍斯基 (Stefan Zeromski)。澤氏的成就與競選的條件雖不見得比雷氏優越，可是也絕不會比雷氏遜色。在一般波蘭人的眼中，他象徵著他們祖國的良知——那時波蘭已經掙脫異族的統治而成爲一個版圖完整的獨立國了。澤龍斯基是在波蘭輿論界的傾力支持下出馬競選的，因此他可說是這個新興國家的「正式」候選人。雷蒙特的聲勢不及澤氏浩大。從波蘭還沒有復國的時候起，推薦雷氏的工作便一直都是由克拉科帝國科學院之文字學研究部獨力承擔的——當時波蘭雖已獨立，可是該學院仍然沿用奧據時代的名稱，沒有將「帝國」二字剔除。

如就純粹藝術以及文學價值的觀點言之，瑞典學院的抉擇可以說是相當公正的。雷蒙特的農村四部曲縱使稱不上是一部「民族的史詩」，也仍舊是一部傲世之作。澤龍斯基的作品雖然充滿了高貴的愛國情操

，可是却沒有一部能够和雷氏的四部曲相頡頏。所有的斯拉夫文學專家都同意這點。

當然，瑞典學院也可以比照一九一七年的例子，把獎金同時頒給雷蒙特和澤龍斯基這兩個波蘭作家。學院如果這麼做，則必然可使波蘭的輿論界「更滿意些」。然而瑞典學院却採納了專家們的建議，不肯讓政治因素左右她的頒獎決定。有位專家建議學院把獎金同時頒給雷蒙特和一位捷克作家，吉拉賽克——這項建議當然是更不可能爲學院所採行的。

雷蒙特當然也是經過一番苦戰才獲獎的。參加競爭的各國作家裏頭不乏好手——其中包括幾位未來的得獎人，如蕭伯納、德富達、湯瑪斯曼等。

獲獎消息傳來時，雷蒙特已經全身癱瘓，因此無法親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他於翌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九歲。